

# 殷瑋璋教授蒞館

## 講學心得暨演講講綱

研究典藏組 李德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研究員殷瑋璋先生蒞館講學，自2001年11月20日至12月19日，為期一個月，講學主題為『史前與三代考古學』。係本館延攬大陸地區專業人士申請來臺講學案之第二位，經費主要由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補助。

殷瑋璋先生1936年出生於上海市，1954年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門化，1959年畢業，同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服務，1969年獲國家科委（現稱科技部）聘為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成員。近年退休後，仍擔任該所學術委員會成員、學位委員會成員。先後主持過河南偃師二里頭、湖北大冶銅綠山、北京房山琉璃河等大遺址的科學發掘，歷任考古隊長、三代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職。專業特長為三代考古、青銅器和科技史。1998年10月至1999年4月在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為選修中國考古學的研究生講授三代考古專題課。

殷瑋璋先生除在本館進行二次專題演講之外，應各地博物館、學術單位邀請，在高雄、台南、台中和台北各地參訪與座談演講。茲徵得殷先生同意，將其來臺講學心得及在本館專題演講提要刊載如下：

### 一、講學心得

應史前文化博物館陳義一館長的邀請，我於2001年11月20日赴台講學。在為期一個月的行程中，除在台東市的史前文化博物館學習交流外，還去高雄、台南、台中、台北等城市進行參觀訪問。在各地的博物館、大學和研究所中，看到了許多新出土的實物資料；也看到了過去一直想看到的安陽殷墟五十年前出土的各種文物和台北故宮的豐富藏品；參觀了正在發掘的卑南遺址考古工地，同行朋友認真細緻的工作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踏察了寶島的多處名勝古蹟，了解到文物保護方面的情況；從同行們的出色工作與取得的許多成果中，使我學到了許多東西。

此行的另一收穫，是與各地博物館、大學、研究所的同行朋友就共同感興趣的學術問題進行研討。在熱烈的氣氛中，大家發表各自的想法，暢所欲言，注重證據。從中，我感受到同行們的嚴謹學風和客觀求實的精神。

我在台東逗留的時間較長，與史前館的朋友接觸較多。巨大的館舍，現代化的設施，其“硬件”是一流的。但對新館落成不久的朋友們來說，“萬事開頭難”，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例如為滿足觀眾的要求已經搞了一個不錯的特展，還要籌備

兩個月後的楚文化展覽；博物館設施的維護與日常管理的任務不輕，每天還要處理許多新的業務往來；圖書館書庫的整理編目工作要做，還要了解圖書市場的情況，提出選購書目並外出採購；卑南遺址的發掘中由於暴露的建築基址規模很大，必須考慮擴大發掘範圍，並弄清遺存間相當複雜的關係；文化園區的史前遺存展館每天要正常開放、接待遊客，為配合園區的藝術性活動，還要做好各種前期活動；其他單位召開的有關學術研討會必須派人出席；編輯的各種報告、文集要按時出版；還要接待像我這樣的客人；凡此等等，都是館內同仁承擔的任務。但全館正式編制的員工僅有30餘人。聽到館長介紹中提到的這個數字，令我十分吃驚，並且肅然起敬。誠然，對每個研究人員來說，除了要完成上述任務中分擔的部分外，還須完成每年規定的課題研究任務。我看到：在館長的領導下，全體員工勤奮中有條不紊地進行，並適時完成各項任務。這種敬業精神在創造性勞動中得以充分體現，使我十分感動！

我曾翻閱了史前館最近幾年的出版物，其中有發掘報告、論文集、卑南遺址與史前文化博物館展品陳列的介紹等等，每冊論著中圖文並茂，內容十分豐富。其中，有一份前往歐洲考察幾個博物館的報告，引起我的好奇與興趣。這份報告詳細紀錄出訪的目的、行程、結果、人員、費用等內容，從中看不出任何遊山玩水的痕跡，讀到的是為完成任務而認真、細緻的記述，很是感人。我沒有詢問這一報告的內容是否在建館中被採納或採納多少？但它的內容詳實，還有插圖，是一份很好的資料、很好的考察報告。它的出版，對其他單位也有特定的參考價值。從這個例子

也可看出她們的敬業精神。

負責接待我的先生，在我赴台前在電傳中曾多次交往，我以為是行政人員，或是館長的行政秘書。在機場見面後，我從談話中知道它是台大畢業的專業研究人員。他在史語所工作過一段時間，至今仍下田野、搞研究、還兼負許多事務。在我訪台的這個月中，他多次出差，還去台北參加研討會。他承擔送往迎來的事，是非常瑣碎的，但他十分負責、周到。甚至在我演講前，他還要將內容提要打印，以便在會上分發給大家。這種熱情、耐心、細緻的工作，令我感激和欽佩。

有一種感受，直至今日仍令我難以忘懷：所到之處，都受到新朋老友的熱情照顧與關愛，讓我一直沉浸在溫馨的氛圍之中。為了讓我多參觀、多學習，多與友人交流，日程的安排緊湊而合理，令我每天在新環境中，都能學到新的知識，使我過得特別充實。這種親情般的熱情與友愛，給我的感受之深，將永遠印在我的腦海之中，成為我永久的記憶。這是我在訪問其它地方時，不曾如此深刻地感受到的。

三個月過去了，但一幕幕場景仍在腦海中浮現；回憶起朋友們對我的關愛，心中終是暖融融的。藉此機會，我深深地向大家道謝！

願海峽兩岸的交流進一步加強！

願我的新朋老友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多成果！

殷璋璋寫於北京

2002年3月18日



## 二、專題演講之一：

### 三代年代學研究的新成果——夏商周斷代工程簡介（2001.11.23）

中國的歷史悠久，文獻記載三代列王世系也很明確，但確切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這種情況不能不說是個缺憾。所以自漢代以來，歷代學者均在研究三代年代，力求有所突破。但因方法單一或受科技手段的限制，雖提出了不少意見，但三代的年代卻一直未能解決。“夏商周斷代工程”組織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眾多專家進行協作，聯合攻擊，目的在於建立公元前841年以前的三代框架和推定武丁以後商周兩代的王年。

“工程”除了依歷史文獻記載的天象資料用天文方法計算，以獲得三代的年代外，還依據考古分期的研究成果用碳14測年方法研究三代年代。採用這一方法研究歷史時期的年代，是一條全新的思路。實踐證明它是可行的。這一研究途徑，為三代年代框架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這個框架中，一些關鍵年代得到歷史學、天文學研究計算結果的印證，從而證明它是合理的、可信的。

例如：根據陝西長安縣馬王村發現西周晚期——西周初期——西周早期——西周中期的文化層堆積，採選系列含碳樣品進行測年，得到的年代圈定了武王伐紂的歷史事件必在公元前1050——1020年這個範圍之中。後經天文學依據文獻所記武王伐紂時的天象記錄，算出武王伐紂的年代為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兩個結果。最後選用了後者。

晉侯墓地中出有“晉侯蘇”鐘的八號

墓，依所採碳樣測得的年代為公元前808±8年，文獻記載晉侯蘇死於公元前812年，兩者年代一致。這一結果不僅證明該墓出土的晉侯蘇鐘銘文所刻的“唯王三十又三年”為周厲王的紀年，而且說明這個年代框架與共和元年為公元前841年的紀年是自然銜接的。

用安陽殷墟文化分期測得的武丁年代為公元前1250±11年。這與天文學家依據甲骨文賓組卜辭所計五次月蝕進行計算得到的武丁元年為公元前1250的結果也是一致的。不同學科的專家在各自獨立研究的情況下取得相同的結果，真可謂殊途同歸。

此外，歷史、考古、古文字、天文等學科在三代王年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較好的結果。

商代前期與夏代的年代因學術界、特別是考古學界對夏代文化和夏商分界等問題未有定論，故暫時估定其年代，日後尚需進一步研究。這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凡此等等，可以看出“工程”提出的三代年代表，不是三代年代學研究的最終結論。但這個年代框架中的一些年代，因不同學科的研究結果甚為一致或十分接近，可證其合理、可信。三代年表的提出，對考古學、歷史學及相關學科的研究，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 三、專題演講之二：

### 史前時期的科技（2001.12.18）

農業的出現被認為是新石器時代的一次革命。考古發現表明，早在一萬年前，中國大地上已出現原始農業。據湖南道縣玉蟾岩、江西萬年仙人洞等地的發現，南

方出現了栽培稻。河北徐水南庄頭雖未發現粟類穀物，但石磨盤、石磨棒等穀類加工工具的出土，提供了農作物栽培業已經出現的信息。這種作物應是耐旱的粟。地處淮河支流沙河南岸、據今八千年前的河南賈湖遺址中水稻和粟同時被發現，反映了在現今的中國版圖內已經形成南稻北粟的農業格局。碳13測定提供的古代居民的食譜信息，也證明了史前居民的這一格局。出土的實物表明，原始的製陶技術也在一萬年前出現。人們的生活相對穩定，為家畜飼養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南庄頭遺址出土的動物遺骸經過鑑定，認為狗和豬可能已被馴養成家畜。磁山遺址中除了豬和狗，雞也成了家畜。河姆渡遺址中除發現豬外，還有水牛和羊，豬和羊還被做成陶塑品。大約在仰韶時期，已經飼養黃牛。

伴隨定居點的出現，對居住條件提出新的要求。因各地自然條件不同，新石器時代的住屋有半地穴式、窯洞、地面建築和干欄式建築等多種形式。一萬年前的遺址中因發掘面積較小，未見到實物，但在九千年前後，可能出現了地面木構建築。在秦安大地灣、洛陽王灣、西安半坡等地都發現了面積超過百米的房舍。河姆渡發現的干欄式建築，表明至少在七千年前，木構建築中已使用榫卯結構。特別是比較進步的燕尾榫和帶梢孔的榫，可以防止構件受拉脫榫。稍後一些時候又出現了承重牆。這些創造，為大型木構建築的出現創造了條件。此後在建築方面又有不少改進，如地面採用的防潮措施；多間相連的排房；推拉式木門的應用；夯築技術與台形建築的出現；土坯壘牆技術的應用等等，都留下了建築技術不斷進步的印痕。

八千年前出現的琢玉技術，在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綻放出異彩。人們對美的事物的想像在創造中得以實現，是對美的一種追求，人們在追求中不斷創新工藝技能。到了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已將加工對象擴大到水晶、瑪瑙、綠松石、孔雀石和象牙等品種。賈湖出土的骨笛表明，在七千年前後已出現七聲音階。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漆器，說明當時已掌握了髹漆工藝，它不僅使木質器具更加耐用，而且十分美觀。凡此等等，反映了古代先民在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取得了極好的成果。

七千年前出現的鑿井技術，使瀕水而居的狀況得以改變，從而使人們的聚居生活更趨穩定。磁山遺址中出土的紡輪，反映了原始紡織技術的出現；吳縣草鞋山出土紡織品實物，都是緯線起花的羅紋織物，織出山形斜紋和菱形斜紋，顯示了這一地區相當進步的織造工藝。河姆渡遺址中發現的管狀骨針、骨刀、木質緯刀、木卷布棍等遺物，被認為是原始腰機的部件和引緯工具，反映了原始紡織技術有了進步。良渚文化時期發明了用原始機織造絲織品的技術。

姜寨遺址發現的黃銅殘片，說明在六千年前，人們已經掌握原始冶銅術。它的出土，說明人們不再滿足於用簡單加工石材的方式製造工具，他們要從礦石中提取銅金屬，再去製作工具與用具。這是一個巨大的飛躍，預示一個新時代將在日後出現。馬家窯文化中發現的青銅刀，經鑒定為銅錫合金，刀口一、二毫米寬處有樹枝狀晶體排列，說明是鑄造的工具，反映了人們已經掌握青銅鑄造技術。在鍛造和鑄造技術同時並存一段時間後，中國的許多地方先後進入青銅時代。



鄭州西山發現的仰韶時期小城堡，反映了夯築技術在六千年前已經出現。用攝氏千度上下的高溫燒陶，使仰韶時期生產出許多絢麗多姿的彩陶。仰韶文化晚期還出現了白陶。以後還出現了台形建築。至四千年前，中國的大地上出現了許多中小型城堡，大多用夯土構築。快輪製陶使陶器生產擴大並趨專業化：生產出薄如蛋殼的陶製品。採用控制窯內溫度，讓窯內陶器在還原焰中焙燒，燒造出黑色或灰黑色

的陶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器上留下的朱書“文”字，公認為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此外，史前時期的數學、物理、化學、天文、醫學等方面，也都有不少成果。凡此等等，都為我們認識三千年前商代先民創造的燦爛的青銅文明，提供了深刻的背景材料；也為探討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與發展的途徑與動因，提供了極好的素材。

## 參考文獻

殷璋璋：〈三代考古學研究的新突破〉《考古》2000年1期

殷璋璋、曹淑琴：《中國遠古暨三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 殷璋璋先生於本館前留影（2001.11.23）

